

经济体制改革

与精神文明建设

肖秀清 王乾坤 主编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经济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

肖秀清 王乾坤 选编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经济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

肖秀清 王乾坤 选编

责任编辑 宋绍忠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武昌喻家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蒲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64,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3255—002 定价:1.30元

序 言

黎 智

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时代的强音，生活的主旋律！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就是我们建设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必须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不仅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因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地把城市首先是大城市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心，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乘胜前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要不断改进生产关系，使人们的思想、科学、文化、道德品质以及社会风尚都有更大的进步和提高；不仅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且要造就一代新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四化”干部队伍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特别是有理想、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因此必须加强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把城市建设成为科学研究中心、文化教育中

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的中心，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近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刚刚在起步，还有许多必然王国没有被认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高进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去年在武汉召开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讨论会，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更有利于这种探索和创新不断深入发展。

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联盟，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多侧面、多学科的研究，并且坚持下去，进而求得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系统认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而努力。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序言.....	黎 智	
谈谈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精神		
文明建设.....	李传华	1
为自由鸣炮.....	胡德平	14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	李 奇	21
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		
必须同步进行.....	杨洛 王进 黄绍辉	28
改革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杠杆.....	王福霖	38
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与贯彻现		
阶段政策.....	应克复	44
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而不是它的最终尺度.....	王锐生	53
道德观念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陶德麟	61
改革者的道德与道德的改革.....	马兆民	74
社会主义劳动态度也必须提倡.....	谭明儒	85
论生活方式的改革.....	易宏伟	96
论思想政治工作承包责任制.....	俞哲文	110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正确处理		
“富”“教”“纪”的关系.....	张可宪	121
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实践.....	林发茂	127
市级社科研究机构在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职能及其实现.....	王乾坤	139

论中心城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齐平 冯永宽	149
中心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其		
对周围农村的影响·····	王 进	159
城市的基本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	梅保华	170
论城市美的系统构成与建设·····	杨曾宪	180
城市物质环境与精神文明·····	熊淑一	190
新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刍议·····	朱生华	199
图书馆与城市思想文化·····	王 霖	207
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魏久明	215
后记·····	编 者	227

谈谈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李 传 华

由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讨论会”，内容很丰富，使我很受启发。有这么多的同志热心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努力在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提出新见解、新建议，这是使人高兴的。会上有同志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来研究，若与这个要求相比，这个会当然只是个开头，但这是个很好的开头。这个会的气氛很好，思想很活跃。许多老同志和青年同志在平等的基础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有些意见不全一致是正常的。听意见主要是听不同意见。应鼓励探索，鼓励争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研究，最后用实践这个唯一的标准来检验，来解决。

下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这个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即怎样适应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的形势，来进一步加强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 关系。这次讨论把议题集中到这上面是恰当的，讨论和发言点到这个题，破了这个题，头开得好。但这方面的文章还需要大家结合实际工作继续去做，不可能希望一次会议都做完。原因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不久，宣传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自己也有个适应和消化的过程。这个决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全文围绕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回答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理论

上有突破。我们宣传理论战线的同志对经济工作，对经济改革还不大熟悉，要到改革实践中去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表议论。

城市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能不能从学习《决定》的第九条和第十条上得到回答？我觉得，“关系”似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一是第九条讲到的知识和人才问题，这是改革的关键，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中央多次提出两个“尊重”，即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要同轻视科技，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为作斗争。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里多次提到，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国庆讲话中又强调。国庆讲话关于国内部分一共才203个字，而讲到这问题就用了83个字，而且用两个“大大”，两个“真正”来突出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十条中第九条即“起用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小平同志这个指示要很好地体会。中国的“四化”有许多条件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才问题，要把人才问题提到这样的战略全局的高度。发达国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智力开发，重视人才。美国是兼收并蓄的。二次大战时，犹太人大量跑往美国，他们既有知识又会经商。华人学者在美国占有很大比重。还有日本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稀烂，为什么起飞得这样快？原因是人才还在，他们历来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智力开发。在日本，当教师的地位、待遇很高。现在党内、社会上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了。但为什么中央还需要这样三番五次地强调，以至现在还这样斩钉截铁的语言？这是因为生活中还有种种糊涂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还确有拨乱反正的任务，有个在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上重新启蒙的问题。

“文革”摧残教育，耽误了一代人，恰恰是在世界科技大踏步前进的二十年，文革所造成的这个历史的破坏要得到补偿，要比经济上恢复补偿慢得多，难得多。因为人才造就周期长。知识

分子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帽子越戴越大，处境越来越坏，“文革”中到了顶峰。乃至脑力劳动是不是劳动，知识分子是不是劳动人民一部分，这些都成了问题。直至1978年才重新得以正名。这些都违背了“老祖宗”的基本原理，甚至是违背了基本常识。在重庆听到一些反映，知识分子说，“我们是口惠而实不至”。少数工人说，“现在是‘黑手挣钱白手用’——工人养活知识分子”。这不能简单去怪工人，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倾错误造成的影响和后果。知识分子说的“口惠而实不至”，反映了一部分实际。但应该说，“实”在逐步“至”，条件在改善中，但还不尽如人意。中央领导同志说，还有个“水到渠成”的问题。不是不努力，是条件问题，国家还有困难。

“实”是要“至”的，《决定》已明确宣布了，《决定》第七条说到报酬上要“扩大差距，拉开档次”，“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三个“充分体现”，后面还加上一个“尤其要”，即“尤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情况”，我们的改革就是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过去讲劳动，并不一定承认脑力劳动、复杂劳动中的“劳”，所以才有那种“黑手”、“白手”的糊涂观念，影响至今。以前说劳动，往往是指出大力、流大汗、晒太阳、沾油泥。因此，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间报酬倒挂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辽宁一个厂长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百多年前美国一家公司一部机器出了故障，大家找不到毛病，束手无策。后来请来一位工程师，他在机器前蹲了三天，检查观察，找出故障，用粉笔在故障外壳画了个圈。资本家就叫工人根据这个圈进行检修，机器恢复了运转。资本家大为高兴，问需要多少酬金。工程师回答说要一万美元，资本家说：“你就画了那么个

圈，怎么要这么多的钱？”工程师说：“我划这么个圈付出体力只值一美元，但我判断圈的位置所付出的脑力劳动以至以前为积累知识和经验所预支的智力积累值九千九百九十九元。”这说明：①脑力劳动也是“劳”，②这个“劳”创造的价值高。这个浅显的道理，其实“老祖宗”论著里讲了很多。但这观念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搞糊涂了，搞颠倒了。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精神文明建设的同志，还有很多拨乱反正的工作要做。

《决定》第九条归纳了三个“有利于”，在我看来很重要。即“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八个字上，在三个“有利于”这样的问题上加紧自己的工作，以适应改革的需要，为改革开路。

二是可从第十条上看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即十条中提到的三个“越要”：“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如果说第九条是从改革的成败在知识人才这样一个角度点到了改革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那么，这里的三个“越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精神文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角度讲到了两者的关系。

《决定》还有一段话讲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这从积极方面，把改革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展开和

深化了，说明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形成适应生产发展，适应改革需要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应该围绕《决定》提出的“文明”、“健康”、“科学”、“积极”、“向上”、“进取”十二个字多做一些文章。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新课题，这个方面过去做得不够，今后要很好地开拓这个领域。

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关系还可进一步从各方面论证、研究，我只是联系《决定》的内容，讲这么一点粗浅的体会。

第二个问题，全面改革的伟大实践，要求人们进行观念上的调整和更新。改革的实践需要许多适应新潮流的新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抛弃了许多老观念，建立了许多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又大大地促进了改革。总的说，是实践在前，观念随后。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给我们作理论上的概括和建立新的观念提供了基础；但新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回过头对我们的生活、实践起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所以，要适应改革的形势，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

半个月前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党员教育刊物座谈会上，大家议了这方面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党性修养、党员教育，这方面也有不少不适应新形势的旧观念、老框框。前几年，农村改革已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城市的改革也必将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在党的建设、党性修养、党员教育问题的宣传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有的，这就是两个结合。总的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说，就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问题同现行政策相结合。没有这两个结合，要适应、要跟上、要围绕、要配合改革的形势必有困难。就党员教育这个范围来说，我们宣传的基本依据仍是党章、准则。还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纲领，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后来中央文件中概括的“十

个明确”，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结合现实问题回答和阐明生活中的新问题，建立适应新潮流的新观念。

怎么看党员的先进性的问题。过去由于“左”的影响，把贫穷同社会主义，把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在人们观念中，“先进”很难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穷则变，富则修”就是这种观念理论形态的概括。这样的观念多年来的形成和传播，确实已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了。过去说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政治运动上，表现在阶级斗争的坚定性上。这种斗争，由于敌我是非的混淆，结果主要是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在自己的队伍里面斗来斗去，在所谓“斗争哲学”指导下的先进性不可能不是歪曲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以后，党员的先进性应该表现在带头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摒弃、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路线、方针、政策变了，实践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得变。今年六月三十日，小平同志接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党员的先进性，就应表现在带头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上，同时表现在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带动家乡、帮助群众致富上，也表现在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上。过去常说“老实巴交好党员，不三不四挣大钱”，现在看来不那么准确了。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多宣传那些思想好、品德高，同时在事业上有作为、有建树的党员。我听四川同志说，四川农村中专业户党员的比重增加，这是很好的预兆。我们应使更多的党员既是精神文明的标兵，又是勤劳致富的能手。

究竟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很多“左”的、旧的习惯和观念还存在。国家要四化，干部也要四化，这个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经济体制的改革把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提出来了。象干部“四化”中的“革命化”，

按旧的习惯,主要是看历史、看出身。现在看是否“革命化”,除了看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表现外,应该主要看他是否群众化、实际化。开创新局面要求更多的开拓型的干部。一个县委书记说:“过去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看人,到处是敌人;用派性的观点看人,到处是仇人;用发展经济的观点看人,到处是能人。”这一体会是富有哲理的。看人、用人的观点和标准都有一个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问题。过去讲干部带头,主要是宣传他苦干、实干、熬夜、流大汗、沾油泥。苦干实干今天也是不错的,但应该看到新形势已提出新的要求。新的形势要求干部要有较高的决策指挥能力;要求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知识面广,文化水平高;要求他们信息灵、点子多、节奏快、创新意识强。我们讲干部带头应更多地讲这些方面,这样,陈旧的观念才会逐渐地消除。

怎样宣传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但它的内涵主要指不怕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讲节约主要是反对挥霍浪费,而不能因此与消费对立起来,忽视消费,片面强调节衣缩食。生产是决定消费的,但消费又会产生新的生产需要,对生产有反馈作用。过去不懂市场的作用,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个观念要改变。旧的消费观念与长期以来生产发展缓慢有关,也与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中国人苦惯了,革命长期处在艰难环境中,供给制,低消费。那时有那时的情况,难免。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九八三年底,人民手中的购买力已有一千三百三十多亿,其中除了银行存款储蓄八百九十三亿外,群众手中的现款有四百四十三亿。所以必须重视消费和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刺激消费,指导消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在过去是美德,在今天就成为过时的陈旧观念了。过去批评“奇装异服”,这个概念本身就含义不清,拿到下面去,又层层加码,看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搞文

明月，一讲反“污染”，就看人家的头发、裤管，不剪就扣奖金。青年人反问：裤管一尺是社会主义的，一尺二就是资产阶级的？胡子不理，马克思不是大胡子？头发长，恩格斯头发就很长！确实解释不清。在这样的问题上可以把神经放松一点，无可无不可，正面引导一下就行了。有的群众来信问，难道青一色、灰一色就好？你说中山装正统，他还觉得好端端的衣服为什么要补上四个疤？当然，不是说中山装就不行，生活总是多样化些为好！前年提倡“婚事新办”，总的说来家长和青年们是满意的。但也有些讲法和提法过了一点儿。连“热闹”两字也不提了。婚礼应提六个字：一是“文明”，二是“节俭”，三是“热闹”。

“热闹”这两个字人们最喜欢的。我们提倡文明婚礼，反对大操大办。象那种“最少二千五，多的往上数”，为了结婚欠了一屁股帐，甚至闹到“从洞房到牢房”，当然不好，刹这个风是有好处的。但是宣传五块钱办个婚礼，这就过分了。人家不就一个儿子，一辈子就一次，要求五块钱结个婚，不近情理。借结婚为名敛财是不对的，但如人家经济允许，办个三桌五桌，七桌八桌，请些亲戚好友来热闹一下有什么不好？

“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无论是今天还是今后我看都是正确的。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是对这两个“标准”，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看，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工作上要坚持高标准，多贡献，强调“献身”精神。生活上的标准我想应该补充两层意思：一是，我们提倡人们包括党员在多作贡献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标准。生活的“低标准”不是“凝固”的，是可变的。雁北农民现在提三句话，说要“吃白面，喝啤酒，看彩电”。过去农民不是喝“老白干”嘛，据说现在那里农民喝啤酒非常普遍，县县办啤酒厂。标准是会发展的，现在看来这是高的标准，也许过五年、十年后可能这三句也算低的了。二是共产党员永远应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但是我们的政策，允许人们包括共产党员用正当的方法，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前实现生活上的高标准。我们讲艰苦奋斗，还要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还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社会主义要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对人民还有什么吸引力？

我想，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要注意坚持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提法的稳定性、连续性。这次经济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改革，但也不是个别问题的改革。套用这个话，我们改进宣传工作，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观念，也有个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提法的连续性问题。这个问题，十二大文件上已作了正确表述。关于共产党思想道德与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话，意思说我们在思想上应该坚持共产主义，旗帜要鲜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时要注意层次性、渐进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宣传那些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典型，宣传生活中带共产主义因素的东西。总的说来，前一段宣传的罗健夫、张海迪、朱伯儒、“两湖一山”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并不感到宣传这些就超越了历史阶段，超越了人民觉悟，离开了目前进行的四化建设。相反，倒是起了激发人民为四化奋斗、献身的作

用。《湖北日报》的同志告诉我，不同层次的青年都从张海迪身上得到了力量。我们讲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讲大公无私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没有去宣传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事实证明群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有教训，也有失误。比如关于潘晓的讨论，许多同志（包括许多青年）就有不同意见，认为潘晓的思想是与时代精神不合拍，艾艾怨怨，过份的消极，不能给人积极进取的力量。当然，就象潘晓这样在思想上发生过迷惘偏差的青年也是会转化的，如果我们的引导是正确的，她也会并且事实上已开始向正确的方向靠拢。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为了适应全面改革的形势和建立有生机、有活力的经济体制的需要，进一步改进、改善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大家比较习惯说：“宣传改革和改革宣传”——这话也没有错。但确切讲，是要适应全面改革的形势和建立有生机有活力的经济体制这一总的要求来改进和改善。“改革”指的是体制，思想工作从内容到方法，还是用改善、改进这样的说法确切一些。

总的说，应按整党中提出的要求，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各项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都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就是为总路线、总任务、总目标服务。这方面，我们还有围绕中心服务不够的地方和方面，必须象《决定》中说的那样，“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我想：我们的“改进和改善”就是这“一个服务”、“一个结合”。

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来改进和改善。

一是增强实践性，寓教育于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最大的实践当然是经济活动、生产建设（包括流通领域），要结合经济活动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参加改革的实践，站在改革的前面。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大的课堂。农村改革就是靠实践来说服人、教育人的。列宁在讲到共产主义教育时提到了实践的原则，我们的党章在讲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时，也强调要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实践的原则是一切思想工作普遍适用的原则。除了经济活动这个实践外，组织人民参加改造党风、社会风气，也是生动具体的实践。我们组织的学雷锋服务队既传播了新风，送了党的温暖，自己也受到生动的教育。青年通过这样的实践，理解雷锋说的“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就有血有肉了，比干巴